

泥金写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流失和考察*

史金波

内容摘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法国人毛里斯等将西夏文泥金写经《妙法莲华经》6卷掠往法国,伯希和参与其事。其中3卷藏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其他辗转藏于德国。据该经序言等考证,其由汉文译为西夏文的时间为西夏前期的惠宗时期,后又经校正。该写本为八百多年前西夏时期的古籍。现存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第二、六、八卷,装帧考究,缮写精绝。该经版本为八卷本,与流行的七卷本不同。利用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可考知八卷本的结构及两种版本所含各品的异同。追溯国内外专家对此文献介绍、研究的历史,伯希和与毛里斯都曾介绍、研究过此经,而清末的鹤龄可能是最早破译此经并取得较大成果的专家,也是近代国内外识读西夏文字的第一人。此后罗福成、邓隆都有新的建树。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刊登了此经卷第一卷首经图和两面序言的照片,保存了珍贵资料。

关键词:西夏文 《妙法莲华经》 泥金写经 伯希和 毛里斯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创制并推行了民族文字,形成了灿烂的文化。随着西夏王朝的灭亡,其主体民族党项族逐渐融汇于其他民族,淡出历史舞台,其文字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典籍文书亦被历史淹没,后世竟难以见到传世的西夏文文献。

19世纪初,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在凉州发现了《西夏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第一次重新见到了死亡已久的西夏文字^①。而重新发现的第一部西夏文书籍,则是西夏文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西夏文名为𐵇𐵬𐰀𐰆𐰃𐰏。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项目批准文号 11@ZH001)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①张澍：《书天祐民安碑后》，《养素堂文集》卷十九，清道光十五年（1835）刊本。

此泥金写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发现,本身就有着传奇的经历,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负载着那个时代的悲哀。原来这部书与中国近代史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庚子之乱有直接关系。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进北京后,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实际上抢劫时间更长。北京陷于空前的战乱痛苦之中。入侵者不仅抢劫金银财宝、古玩细软,还抢劫文物、典籍等。在这一战乱中,法国驻北京领事馆专员乔治·毛里斯(Georges Morisse)、费尔南·贝尔托(Fernand Berteaux),以及当时正在此出差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北京城内“白塔下一堆凌乱的废纸和旧书里”找到了这部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据记载,当时他们找到的经卷一共六册,被毛里斯和贝尔托瓜分,各得三册^①。

自从西夏文文献被淹没数世纪后,这是第一次西夏文典籍面世,是在一种非正常情况下显露真容。从此这些中国珍贵古籍流落异邦,后辗转存藏,其中三册入藏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另外三册被法国人卖给德国人,被存入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现不知所终。

二

西夏文及其文献,兴盛于西夏,延续于元代,式微于明朝,前后有四百多年的使用、流传历史。那么,此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为何时的产物呢?

此经法国所藏为卷第二、卷第六、卷第八共3卷,德国所藏为卷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共4卷。在德国所藏卷第一前有一篇序,为西夏枢密西摄、大恒历院正、授艺广、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旺普信所作,首述此经之重要,次叙其三次译汉经过,再写西夏翻译此经始末。其序中记载:

《妙法莲华经》者,如来之秘藏也。因其法显,佛出世间,集二藉乘,入一真中。文才高广,与须弥山等,义趣幽深,与大海水同。先演三周,诸乘一乘中集;后宣七喻,五性独性中入。此经者西天演说,渐渐流传东土,秦天子朝罗什三藏翻译,此后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兴起番礼,制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超凡,德行殊妙,治理民庶,无可比喻。前朝已译多夥,然此《莲华经》尚未翻译。今圣母子已袭王位,恭信三宝,治国行德;令先祖礼繁盛,为后帝所习取。以德行业,与日月齐明;以孝治民,总万国皈依。发出大愿,以贤手译,年面未转,一部已毕,国中传行,各处受持。是故众生逐日兴盛,患难永代绝离。臣智微才弱,学殖未深,不自量度,略作序言。我者譬如微尘依山,不能为万丈高;露滴入海,未能与百谷水味

①[法]伯希和著、聂鸿音译:《评〈西夏研究小史〉》,《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75-177页。

合。^①

由此序可知,西夏风角城皇帝创造了西夏文字。风角城皇帝即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此序中的记载成为元昊时期创制西夏文字的有力证据^②。文中所提“兴起番礼”、“翻译经典”、“武功超凡”等均为元昊的突出作为^③。元昊时期开始将佛经从汉文翻译成西夏文,当时翻译佛经不少,但尚未将《妙法莲华经》译为西夏文,而在“今圣母子已袭王位”的时代,才将鸠摩罗什从梵文译为汉文的版本译为西夏文。“今圣母子已袭王位”的说法当是指西夏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即母后当政的朝代。据历史文献记载,元昊去世后西夏历史上曾连续经历三次皇帝幼年即位、母后当权的时代:元昊子毅宗谅祚即位后,母后没藏氏太后当政;谅祚子惠宗秉常即位后,梁氏皇太后当政;秉常子崇宗乾顺即位后,母第二梁氏皇太后(第一梁太后侄女)当政。那么序中所称“今圣母子”系指哪一个朝代?黑水城出土有多种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其中有一种刻本,各卷在经名后都有译经题款,译为:“天生全能、禄番佑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就德主世、增福正民、明大皇帝嵬名御译”^④,明确记载了此经的译者。此题款中的明大皇帝和皇太后梁氏,是惠宗秉常和他的母亲梁太后^⑤。西夏将汉文佛经三千餘卷翻译成西夏文,历经景宗、毅宗、惠宗、崇宗四个朝代,共用了53年的时间。此《妙法莲华经》的翻译时代较早,当在惠宗在位期间(1069-1086年)。

此经序称译经时代为“今圣母子”,可知序是在西夏惠宗时代译经后撰写的。又见此经各卷卷首经名后有“奉当今皇帝敕重校正”的题款,校正时期应晚于译经时代。

我在2011年6月曾造访法国吉美博物馆,披览此经,见其纸张、装帧等不类元、明时代西夏文文献,应属西夏时期遗物。作为八百多年前的泥金写经,在国内十分罕见,更何况还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书写,更是难得。从时代和文字类别看,此经十分珍稀。

①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附录“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译文”,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4-236页。此次翻译文字及标点与当初略有不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可见该写卷卷首书影和罗福苾抄本翻译。

②汉文文献中对西夏创制文字时代记载有歧义,有的记为德明时期,有的记为元昊时期。通过对汉文资料的分析,特别是用西夏文文献的证明,西夏文的创制,应在元昊时期(史金波:《也谈西夏文字》,《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

③西夏文文献中的风角城皇帝为元昊尊号,风帝是其省称。又见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还见于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藏西夏文《大白上国新译三藏圣教序》。

④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9-287页,编号:ИHB.No.4631、2436、4562、3900、67、782、7234、3901。

⑤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年总第一辑,第215-228页。

关于此书的版本形制,得到此书的法国人毛理斯曾于1904年撰文介绍:“这部书在我手边共有三卷,第一卷首叶贴有一张汉文的纸签,表示这是著名佛经《妙法莲华经》的西夏文译本。每一卷都装在一个厚纸板的封套里,内衬一层黄色薄绢,正面覆以带花朵和金箔饰缘的蓝绢。书卷本身以绿绢封面,高33厘米,广12厘米,绀青色厚纸经折装。经文为界线分明的金书写本,每半叶6行,行19字。文字用致密而柔韧的毛笔写成,清晰工整,极其秀美,字形结构始终繁冗而优雅,与著名的居庸关西夏铭文相同。”^①

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中,罗福苕先生对此书形制也有简明而专业的描绘:“皆绀纸金书,青绢面上有被覆为薄函,其里纫黄绢,外纫蓝绢,上描金花叶,经首有佛像一页,经文每半页六行,行十九字,缮写精绝。”^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中,还有此经卷首的经图2面(见图1)和序2面的书影。经图人物众多,绘制精细、繁复,右侧有双勾大字西夏文8个,译为“妙法莲华经契变相”,图中人物旁分别有西夏文榜题,译文为“地藏菩萨”、“妙音菩萨”、“文殊菩萨”、“四阿修罗”、“紧那罗众”、“八龙王”、“四梵王天帝”。序言文字工整、秀丽,书法上乘。由此可初步窥见该经的大致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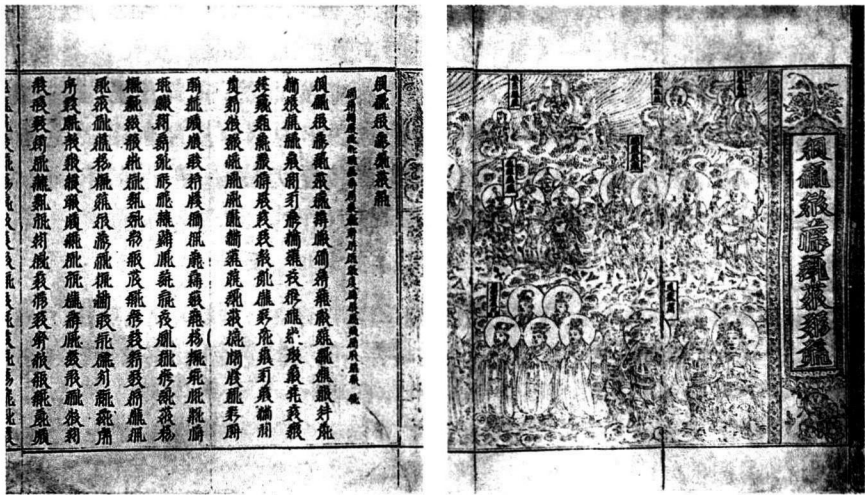


图1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刊布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书影

尽管此前对此经有初步了解,但2011年当我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亲眼目睹此经、打开观看时,还是觉得眼前猛然一亮,感到震撼。在我过眼的古籍中,此

①[法]毛理斯著、唐均译:《西夏语言文字初探》,《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97-100页。

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第189-190页。

书以其年代久远、装帧考究、版本上乘、书写精湛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小心翼翼地展开此书,欣赏书衣,翻阅经折,审视页面,阅读文字,厚实、坚韧的瓷青纸,底色深沉,满目金光灿灿的经文,字迹清晰,赏心悦目。

泥金写经由来已久,但早期唐宋本传世极少。敦煌石室所出几件泥金写经,皆为存世稀品,但多不完整。像这样首尾全俱、保存完好的泥金写经,实在罕见。此经因其时代久远,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四

《妙法莲华经》从梵文译为汉文主要有三个译本:第一个译本是西晋高僧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为十卷,二十七品;后秦鸠摩罗什又一次翻译了《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再后来隋朝阇那崛多第三次翻译此经,二十七品,称为《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影响最大。此经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二十八品中,前十四品是说一乘之因,后十四品是说一乘之果。

鸠摩罗什译《法华经》有七卷本、八卷本之别。梁僧佑《出三藏记》、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皆记为七卷。在早期的一些写本中,也有八卷本的记载,如唐开元间智昇编撰的代表唐代宫廷写本的经录《开元释教录》中,就有《妙法莲华经》八卷本的记载。传世文献也有七卷、八卷之分,以七卷本流传广泛。在传世的多种《大藏经》中,鸠摩罗什译本都作七卷。中国历代的私刻本、抄本中也多作七卷。而《开元释教录》中所记的唐或唐以前的八卷本写经,则少见流传下来。

唐宋时期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的七卷本和八卷本,在内容上是否有出入,品次是否有变化,过去因缺乏八卷本实物比对,难以做出判断。本文所述西夏时期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应是存世较早、保存很好的八卷本《妙法莲华经》,可用来与流行的七卷本比照对勘,其版本价值异常珍贵。

西夏时期的《妙法莲华经》有汉文本和西夏文本两类,多为20世纪初俄罗斯科兹洛夫探险队自黑水城遗址所得,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汉文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除卷第二仅存六面、卷五卷首稍残外,其他皆保存完整^①。其卷第一卷首经图后有双行款识“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淳睦懿恭皇帝”,此称号为西夏仁宗尊号。在卷第七卷尾有雕字人王善惠等人的发愿文,其后有“大夏国人庆三年岁次丙寅五月”题款。此经应是西夏仁宗朝刻本。黑水城还出土汉文本此经二十五品单行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多卷。此外在黑水城发现的汉文《妙法莲华经》还有唐代和宋代刻本,可见此经在西夏影响之广。

^①《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编号:TK1、TK2、TK3、TK4;第225-270页,编号:TK9、TK10、TK11。

更引人注目的是《妙法莲华经》有多种西夏文本,皆为八卷本。其中刻本20个编号。这些刻本也有不同的版本类型。如 ИHB.No.2436等,经折装,面5行,足行15-20字,卷首有梁太后和明大皇帝御译题款,这种版本较多。另有 ИHB.No.805,也是经折装,面6行,行15-16字^①。西夏文写本《妙法莲华经》也多为黑水城出土,种类较多,如, ИHB.No.2359、64、63、65、68等,经折装,面7行,行18字,卷首有西夏仁宗皇帝御校题款,卷末有写经者题款^②。当然,成本最高、版本最好、价值最珍贵的当属本文所论泥金写西夏文《妙法莲华经》。

五

藏于吉美博物馆的三卷西夏文泥金字《妙法莲华经》为卷第二(编号BG17624B)、卷第六(编号BG17623)、卷第八(编号BG17624A,卷首见图2)。

此经经折装,上下子母栏,每面6行,行19字,书法考究,布局严整,字体秀美,字字珠玑,面面锦绣,非一般写本可比。卷第二包括譬喻品第三、信解品第四,卷第六包括如来寿量品第十六、分别功德品第十七、随喜功德品第十八、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卷第八包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陀罗尼品第二十六、妙庄严王本事品第二十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



图2 泥金写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卷第八卷首

根据这三卷各品的布局,并参照其他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刻本和写本,可

①《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3册,第229-287页,编号为: ИHB.No.787、4631、2436、66、4562、3900、6310、7350a、7231a、2317、67、782、6452a、6452b、7231、6452、7350b、7178。另有7231、6452g两号,见西田龙雄编:《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创价学会,2004年。

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3册,第287-301页,编号为: ИHB.No.2359、64、63、65、68。另有 ИHB.No.6253、719两号,见西田龙雄编:《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创价学会,2004年。

知八卷本和七卷本的结构关系。以下是七卷本和八卷本的品名对照表：

七卷本		八卷本	
卷第一	序品第一 方便品第二	卷第一	序品第一 方便品第二
卷第二	譬喻品第三 信解品第四	卷第二	譬喻品第三 信解品第四
卷第三	药草喻品第五 授记品第六 化城喻品第七	卷第三	药草喻品第五 授记品第六 化城喻品第七
卷第四	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 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法师品第十 见宝塔品第十一 提婆达多品第十二 劝持品第十三	卷第四	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 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法师品第十 见宝塔品第十一
		卷第五	提婆达多品第十二 劝持品第十三 安乐行品第十四 从地涌出品第十五
卷第五	安乐行品第十四 从地涌出品第十五 如来寿量品第十六 分别功德品第十七		卷第六
卷第六	随喜功德品第十八 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 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 嘱累品第二十二 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	卷第七	
卷第七	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陀罗尼品第二十六 妙庄严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		卷第八

通过西夏文译本可知，原来七卷本和八卷本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二十八品，各品名称也都相同，只不过分卷不同。七卷本和八卷本相比，第一、二、三卷所含各品都一样，只是到第四卷以后才开始有了区别，八卷本比七卷本的四、五、六、七各卷品数减少，最后形成第八卷。八卷本可能是为了使每卷佛经页数相近，每卷一册，装为八册，厚度均一，而内容和品次顺序未作改变。西夏文八卷本《妙法莲华经》的发现厘清了原来不很清楚的七卷本和八卷本之区别，对认识《妙法莲华经》这样重要的佛教经典源流，具有重要版本价值。

与法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相关的是流失到德国的几卷同类佛经。经过华开奇博士了解,主要情况是:德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曾在1908年购入西夏文深蓝纸描金字本《妙法莲华经》卷一、三、四、五共4卷,后又于1912年购入卷七。在1922年,这5卷被合起来编号Libri sin. 1414,转入当年新建的东亚藏品部。但是后来馆藏被移入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图书馆。据德国的图书馆员介绍,他们在2013-2014年几次去波兰做藏品的电子扫描时,没有发现这些经本。他们怀疑经卷是否于二次世界大战时遗失。以下是柏林图书馆关于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介绍,见于当年的手写目录(华开奇译自德文):

1414,

1907年获得,203

卷1,3,4,5。西夏文翻译汉文版《妙法莲华经》,梵文名为Saddharmapundarika sutra,意为“妙法莲花”。折本,深蓝色纸,金字。每卷前有扉画。共有四套(盒装),浅蓝色并黄色丝绸包装。书架上横着放置(而非西文书的竖放)。见G. Morisse, *Mémoires présenté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series I.11, 2 (1904), p. 314-379.

(四卷)一并封印(包装)

1912年获得,171

第7卷(缺第2,6,8卷)

如果这些珍贵写本果真遗失,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仍然抱着找到这些珍贵古籍的强烈愿望。

六

此经于1900年被发现后,引起了当事人之一伯希和的高度重视。伯希和1902年参加在河内举行的首届远东研究会议,又得到了毛理斯那几卷西夏文《法华经》中的一卷,并且拿到会议上展示。

毛里斯于1904年公开发表《西夏语言和文字解读》一文,简介其4年前得到的三卷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他提到第一卷首页贴有一张汉文的纸签,毛里斯借助这张纸签得知了经名,当然便很容易找到汉文经文与之对照。他用汉字对译了《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前三页共18行,并通过西夏译文初步分析了西夏文语法。

毛里斯对所得《妙法莲华经》的解读研究进展,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好评。然而要特别提出的是,毛氏的成功可能得力于一位中国学者。原来在此《妙法莲华经》第一卷首页贴有一张白色汉文纸签,在西夏字的右方已有工整秀丽的汉字注释,注明此为《妙法莲华经》。这样看来,在毛氏之前已有中国学者试通其文。此人是何许人呢?据贾敬颜教授介绍,清代学者鹤龄在北京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城(今呼和浩特)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妙法莲华经》,鹤龄遂判断该经必为

《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卷数字^①。联系鹤龄事迹，可以推想，上文提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毛里斯等在北京白塔下找到的经册与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卷册可能有关。或许鹤龄精心探索并将所获初步成果写于白纸上，毛里斯看到后才有所启发，循此继进，取得新的认识。若果如此，那么鹤龄当是西夏文成为“死文字”后，在破译方面取得较大成果的专家。

伯希和提到这些西夏文佛经是在北京“白塔下一堆凌乱的废纸和旧书里寻到的”。北京的白塔位于北京西城，是至元八年(1271)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修建的一座藏传佛教喇嘛塔，历八年方竣工。后以塔为中心建庙，名大圣寿万安寺，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毁于雷火，明重修寺庙，更名妙应寺。此寺庙元代是蒙文佛经的翻译刻印中心，不少元代的佛经卷末款识都提到该寺。鹤龄就职的西华门清字馆距此仅约一公里，鹤龄是否居住在附近不得而知。

北京城内著名的白塔，除妙应寺白塔外，另一座是北海永安寺白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妙应寺和北海都遭到劫掠。那么，这些西夏文佛经究竟是与哪座白塔有关呢？妙应寺白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曾是当时翻译、刻印佛经的中心，刻印过回鹘文、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佛经。当时西夏后裔影响还很大，有元一代尚通行西夏文，也许这一佛教文献中心保存了西夏文佛经。而永安寺白塔修建较晚，始建于清初顺治八年(1651)，那时西夏后裔可能融合殆尽，入藏西夏文佛经的可能性很小。然而所提的“煤山”又与北海较近。因此究竟是哪一座白塔下发现的西夏文佛经，这些佛经是白塔所存，抑或是鹤龄得自绥远古庙所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毛里斯对《妙法莲华经》初步解读，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并进一步解读，罗福成于1914年写出《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一书。此书序中介绍了此经情况：

……毛利瑟始得西夏译本《法华经》于我京师……毛氏尝考释《法华经》卷一十八行，虽其疑而未定及不可识者什尚二三，然其所辨释者，则勾稽至密，开辟丛蚕之功，盖首推毛氏矣。……所见西夏国书除家大人所藏金石刻辞外，仅得伊凤阁博士赠家大人之《掌中珠》九纸，日本羽田学士所赠《法华经》三纸而已。秋九月乃又于羽田君许得见毛氏书，爰以课业之暇，将毛氏所疑所阙就管见所及知者，为之补释，复将羽田学士所赠《法华经》三纸并为考释。校写既毕，姑印存之。异日倘所见较广，或更有跬步之进，则此区区者固不足存。第以自验学力而已。宣统甲寅九月中旬上虞罗福成序于曼珠沙华室。^②

罗福成作书写序时，正值罗振玉、罗福成父子一家在日本时期，与年轻的羽田

①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②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东山学社印，1914年。

亨往来甚多,从羽田氏手中得到法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部分照片。罗福成在序中赞赏了毛里斯对此经的研究,在书中抄录了法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卷第一的3页18行,以及卷第七的9页54行,并做了进一步研究考释。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罗氏书末刊载了4幅照片,一幅是此经卷第一的首三页,每个西夏字左边按先后以阿拉伯数字编写顺序号,共305字,字的右边为对译汉字,外有圆圈者为音译。汉字为楷书,平正流畅,功力颇深,此非罗福成手笔,更非毛里斯所能为。疑此或为毛里斯所得此经第一卷首页所贴汉文纸签。据上所述,此很可能是原在绥远得此经并首先进行破解的鹤龄的手笔。若如是,鹤龄应是近代国内外识读西夏文字的第一人。他的识读成果于今在西夏学界已成为普通知识,但当时西夏文资料极为乏匮,面对陌生的文字,观察描摹,揣度推测,冥思苦想,筚路蓝缕,做出了开创性的考释,十分难得。此后毛里斯、罗福成等于此经的考释也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

《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书中另外三幅照片是此经卷第七卷首前9页。这4幅照片为此经卷第一、卷第七,而这两卷与卷第三、四、五皆不知所踪。因此目前这4幅照片保存了此经卷第一、卷第七的部分真相,显得十分可贵。

1926年又有邓隆作《西夏妙法莲华经考释补》。邓隆(1884-1938),清末进士,也涉足西夏学问。他对罗福成的考释作了补充修正,于文字、语法亦有新得。其序言认为罗氏考释为“吾国研究西夏文之始”,同时也指出“罗氏考释尚不免错误遗漏,至其文法颠倒错纵不加说明,更不易读。乃复发心,略为补缀”^①。然是书未能刊出,仅存稿本。

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中,刊登了此经卷第一卷首经图和两面序言的照片,同时罗福苕先生对序言做了翻译。这两幅照片也同样具有珍贵价值。

目前识别、翻译像《妙法莲华经》这样有汉文文献对照的西夏文文献,早已不成问题。但在整理、译释过程中,对其中的词汇、语法现象做出解释,并从中探索西夏语的奥秘,则还需要做深入的专业研究。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将在中国出版此泥金写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三卷,以其原始面貌重光于世,使这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化遗产“回归”故土,学界藉此可以真切地看到有八百多年历史、遗失一个多世纪的珍贵古籍,堪称幸事。

【作者简介】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

^①邓隆:《西夏妙法莲华经考释补》,国家图书馆藏手稿本。